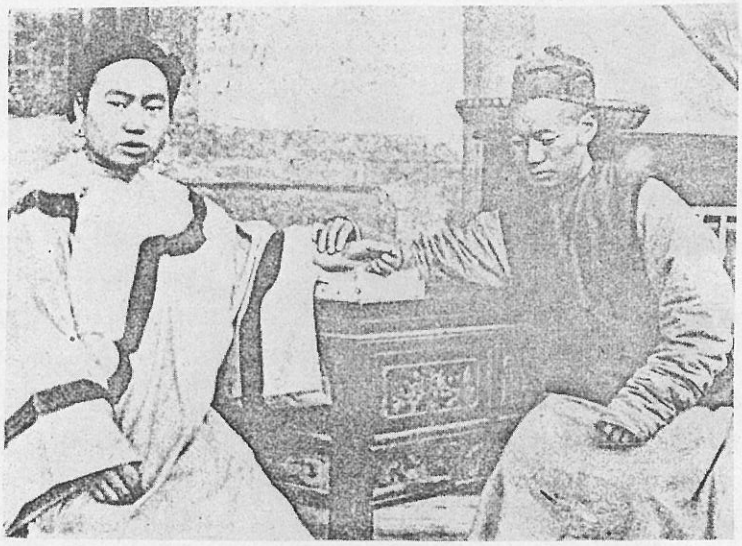
台灣現代醫學的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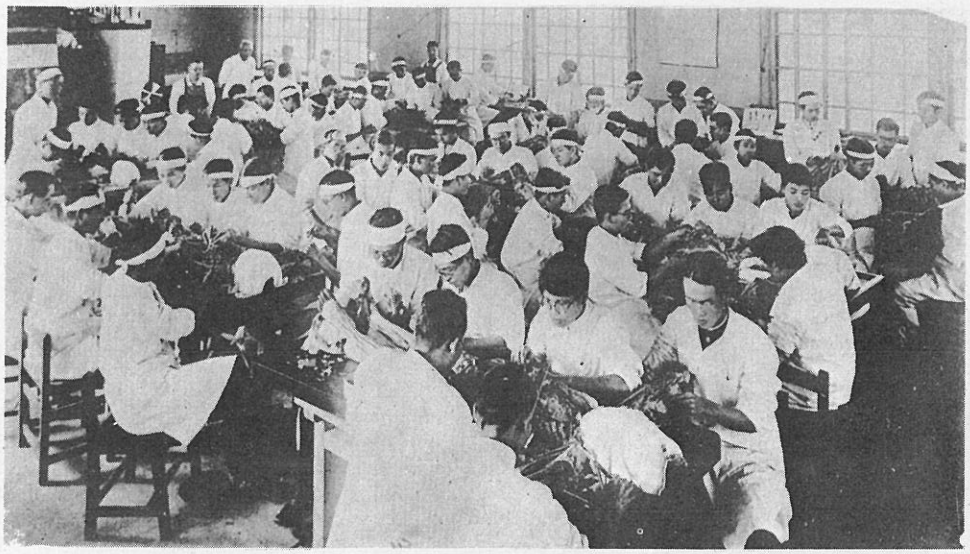


▲漢醫替病人把脈

一八九七年台北醫院院長山口秀高利用該院創辦「台灣土人醫師養成」，這是台灣現代醫學的萌芽點。在此之前台灣的傳染病盛行，但只有漢醫故未能有效控制；當時漢醫的社會地位很高頗受病家的尊敬，病人請他去看病，醫藥費是不能當面送給他的，必須將錢用紅紙包起來，等到漢醫看完甚要回去的時候，派一個人跟在他的後面走，一直走到大門外人少的地方才扯住他的袖子（他的袖子有一尺多寬，而且很長能垂到膝蓋以下）把紅包送到他袖子的時候，他明知道是送紅包給他，但他自認爲是社會上高尚的人士，不好意思回頭來接受，還裝作不知道的樣子，一直向前走，嘴卻說：「不要啦！不要啦！」而手卻直抓紅包，等到抓過手即揚長而去。

當時的傳染病有瘧疾、傷寒、鼠疫、天花、霍亂等，經常三五年就肆虐一次，此外寄生蟲病（如肺吸蟲病）和肺炎、肺結核、梅毒也相當多。因此山口秀高在一八九七年利用台北醫院（即現在的台大醫院）創設「台灣土人醫師養成所」，招收國語傳習所（公學校前身）畢業生，教授普通學及醫學，此爲日本人在台灣醫教育之始。兩年後正式成立「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當時醫學校的修業期限共有五年，預科一年，本科四年。預科讀的是物理、化學等基本科學，本科四年讀的是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投考的資格是十六歲以上的公學校畢業生，一進入醫學校接觸到的即是化學、物理等新鮮科目，但是不作實驗，只是整天記化學方程式和演算公式。醫學校成立之初，本省人因爲聽說要解剖死人，很少願意把子弟送去就讀，所以醫學校不得不出錢招請學生來就讀，後來投考的人多了，投考相當困難，但是每月仍有公費可領，一直到改爲醫專才停止發放。

那時的實習醫院在當時號稱是東南亞規模最大的醫院，耗資之鉅連日本政府都感到吃不消，內部設備富麗堂皇，一般住院病人水準也較高，因此在那裏的實習學生比較不敢動手去作。赤十字社病院，當時在醫學校附近，是眞正的教學醫院，經常有供教學研究的免費病人，且醫院的全體醫師都是醫學校的教員，所以對於學生實習非常方便。當時學生雖只是中等學校程度，但每個人在未入醫學校前都有幾年的私塾經驗，漢文底子很紮實，可說是台灣當時的高級知識份子，尤其不必爲考試所束縛，很能發揮自由研究的風氣，在學問上大有建樹的杜聰明博士及在領導台灣民族運動頗有事功的蔣渭水，可證明當時教育的成功。但是最初一般人對於這些醫學校畢業生並不太信任，有人甚至將他們視爲「江湖郎中」，後來因爲那些小西醫們表現良好，以及日本政府



▲五十年前醫學生的解剖實習

的扶植政策，西醫很快地就獲得了崇高的社會地位。當時醫學校畢業之後隨即開業的佔大多數，而且大部份是在鄉下，出診時有騎馬的，也有騎脚踏車的，也有用人力車的，在鄉間不辭勞苦地奔走治病，不管晴雨只要病家來請一定出診，他們堅守當時台灣第一線醫療工作的崗位，負起維護台灣同胞健康的任務。

一九一八年醫學校改作醫學專門學校（簡稱台北醫專），初期修業年限爲預科四年，本科四年，一九二一年以後，招收的對象改爲中學畢業生，修業年限四年，一二年級是基礎醫學，三四年級是臨床醫學。

當時學生每天帶著便當上學，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一邊聽教授們講課，一邊一字不漏的抄寫筆記，如有聽不懂的地方，一下課，就借同學的筆記來，補抄漏掉的部份，教授的筆記成爲學生最主要的知識來源。一般書籍價格相當昂貴，所以非必要時都不買。

一年級上的「解剖學」分「系統解剖學」和「組織學」二部份，由兩位教授分別授課。課程快結束時，就開始大體解剖實習，全班六十人分成十組，一組六人分配一具屍體。到了三年級開始上臨床醫學，但眞正與患者接觸的機會，一星期中只有上臨床講義的兩小時而已。其他時間和從前一樣，帶便當，從早到晚，抄寫筆記。上臨床講義課時，學生一排一排的高坐在階梯式的座位上，穿白衣的護士，用推送車將患者送進來，放置在中央。由教授叫出五、六個學生出來，排在前面，於是由醫局員報告患者的病歷，接著，教授開始授課。有的教授，從患者的病歷，慢慢講到診斷和治療，說明得清清楚楚，有條不紊，讓被叫出來的學生，聽得入耳。但也有教授僅僅讀一下患者的病歷、和診斷病名，然後就將患者和排在前面的學生丟在一旁，使得患者和學生呆然若失。儘管如此，上課時，已能和患者拉上關係，興趣也就提高了。

四年級時，門診實習就開始了，四、五人分成一組輪流到各科門診實習。那時有兩座實習醫院，一是附屬醫院的紅十字社台灣支部醫院，一是台灣總督府醫院（現在的台大附設醫院），學生們每天在這兩座醫院之間忙碌奔走，接受各科教授的指導。

一九三六年台北帝大醫學部成立，學生是由高等學校畢業後直接升入，原有醫專改稱附設醫學專門部，兩者同時並存。一九三七年台北醫院，正式改組，成立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設醫院，當代日本有名氣的少壯派教授，如病理學的和氣教授，生化學的富田教授，生理學的細谷教授，婦產科的眞柄教授都相繼來台。這一年七七事變暴發，戰爭如火如荼的進行著。每天的報紙，都大肆報導「皇軍」的勝利。日本人莫不得意洋洋，他們把「出征」視同要到什麼地方「徒步旅行」一樣，到處都在舉行慶祝宴，影響所及，日籍醫師大都應召出征。那時候，日籍醫師與台籍醫師之間，表面上看來倒很融洽，安然無事。大家互相拍拍肩，彼此點點頭和睦相處。但是只要在宴會上，酒過三巡，他們就藉酒裝瘋，這時平日埋藏在他們心底的優越感，也就表露無遺。總之，日本人對待台灣人，總是心懷叵測界限分明。在某種程度內，沒有問題。一旦超越界限，就以異己分子，斷然無情排斥。

在中國大陸的戰事逐漸擴大，因此揹著背囊，戴著鋼盔，佩著日本刀的所謂「皇軍部隊」，在太陽旗的歡送之下，經過三線道路（今之中山南路）出征的次數也就越來越多了。當時醫院的日籍醫師和職員，大半應征



▲荷蘭人筆下的早期台灣居民生活

入伍了，他們已沒有像「徒步旅行」那樣的輕鬆氣氛了，步伐都顯得非常沈重。背著「千人針」（日本的一種迷信，在一塊布上，由一千位女人，各縫一針，贈給出征的人，以祝平安之意）以祈武運長久的人也越來越多了起來，因此醫院內各科的醫局，幾乎已成了台灣人的天下了。民國三十二年，戰局已從所謂「大東亞戰爭」演變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了，日本人沒有像以前佔領香港、新加坡、菲律賓時那樣的歡呼，得意，局勢顯然已扭轉了。台灣人也逐漸被徵召充當軍屬或軍夫，台灣醫師們同樣地也被徵召服役了。漸漸地可聽到台北上空B 29轟炸機的吼叫聲，終於在幾個地方，都投下了炸彈，受傷者一個個被送進醫院，這時，地下室就權充臨時手術室。因此，一瞬間，地下室顯得擁擠不堪了。橫七豎八的病床，就像菜市場的菜攤一樣凌亂。受傷的患者，在生死之間，掙扎搏鬪，哀鳴哭叫，再加上那永遠驅不散的藥水味、汗氣味，就像菜市場內，永遠存在的魚腥味及爛菜的臭味一樣，醫師和護士們就在那裏穿梭不停地致力於急救工作。不久第二次轟炸又開始了，於是第二批傷患又蜂擁而至，急救工作馬上又開始，因此醫生和護士們日以繼夜忙碌不停。局勢的發展，越來越對日本不利，空襲警報，也越來越頻繁，市民們開始疏散，不久醫院也疏散到中和，然後又疏散到大溪，只有一部份，留在台北本院，繼續工作。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台灣重回祖國懷抱，於是戰爭結束了。不久，醫院從大溪遷回來，搬運回來的儀器，大都破損不堪，手術器械丟失不少，剩存的也已經生了銹，儘管如此，在玻璃窗裡，就開始門診，並用生銹的刀剪開始動手術。日籍教授除了酒井潔博士等兩三位外，其他全部被遣送回日本了。這時杜聰明教授擔任第一任醫學院院長，接管了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及醫院。醫學部的病理教室在戰時受到直接轟炸而倒塌了，醫院的會議室、第四病房以及餐廳一角，也被炸掉了，中央走廊的前邊被炸得留下一個大洞，眞是滿目瘡痍，一切百廢待舉。不久我國先遣部隊，從大陸來台灣，歡迎的旗幟隨風飄揚，到處可以聽到鞭炮聲，家家戶戶門口也都懸燈結彩。

這時，被暴風吹破的玻璃窗，已經剝落的水泥牆壁，以及直接被轟炸的地方，瓦礫堆集如山，一切都未修復。這期間，大學校長頻頻更換，醫師的薪水，常常一兩個月領不到，一切都在不安定中，偌大的醫院好像在喘息中過日子。在那個時候，不知道什麼緣故，很多人都反對校長，因此，醫學院的學生實行罷課，附屬醫院也弄得雜亂無章。屬於少壯派的醫師，每日都在開會，研討對策，電線桿和牆壁上都貼滿了宣傳畫和標語。一陣暴風雨過後，學園已是千瘡百孔。

那時台大醫學院爲了提高台灣的醫學教育水準，已於接收改組時，停辦了台北帝大時的附屬醫學專門部，並將該部遺留下來的學生編入先修班，等到補修完課程後改編入醫學院。在三十五年二月以後由日本返台醫學生中，有不少醫學專門學校學生，也須要由台大收容續予教育，所以醫學院又爲他們設立一個臨時性的「附設醫學專修科」；一直到三十九年六月爲止。因此第一附屬醫院就供醫學院學生，而第二附屬醫院供專修科學生的臨床教學及實習之用。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第二附屬醫院由長官公署接收，改爲省立台北醫院。這時從日本及大陸來的教授群，如東大出身的嚴智鍾教授，千葉醫大出

身的病理學葉曙教授，東大出身的魏火曜教授，魏炳炎教授，高天成教授，高遠逵教授等個個都是權威的人物，替台灣醫學帶來了一片蓬勃朝氣。但是當時物質條件太差，整個大學未上軌道，醫院的行政管理也很糟，院內到處是破、亂和髒，那時一般社會有一種變相的「民主作風」，校內也難免有此風氣，院內此風更盛。因爲人事問題，附屬醫院醫師們和台大當局起衝突，而醫師們空前絕後的罷診事件就在此時發生。不久「二二八」事變發生於全省，整個社會在不知不覺中，陷於混亂，槍傷患者一個一個地被送到醫院，馬路也不能通行了。

那時小兒科在四樓，起初只有三十八張病床，自來水常枯竭，必須從二三樓搬水上去，電氣消毒器也常壞，注射器的消毒常來不及應急，調乳室未修不能使用。床是大人用的，既大又矮。但是醫師們發揮克難精神，用自做的點滴注射器開始以輸液治療腹瀉症。國外的雜誌也未進來，一切都是靠自己的經驗和研究去開拓改善。那時外科有兩個，即第一外科和第二外科。由徐傍興教授主持第一外科，由高天成教授主持第二外科。第一外科的醫師們，大半是從日本回來的年輕小伙子，他們之中，熟諳英語和法語的人也不少。醫院雖然依舊，被轟炸的地方，多已修復，患者們也都能遵守紀律。光復時的一些怪現象，已不復見了。但是那時外科只是一般外科而已，僅著重於甲狀腺與腹部外科。因此一旦遇上骨折患者，就沒有專門擅長整形外科的醫師。只好臨時抱佛脚似的翻翻貝勒博士的「整形外科學」，再摸摸患者的骨頭，來作診斷。這樣，總是不得其門而入，更無法作專門性的探討。

三十七年七月莊長恭先生繼陸志鴻校長之後，任台大第三任校長。杜聰明教授接嚴智鍾院長重任醫學院院長。附屬醫院院長陳禮節教授辭職返故鄉福州，杜院長提聘魏火曜教授兼醫院院長。那時大陸局勢漸漸不利，台灣社會情緒不安，校內各方動搖，醫院也多事了。魏院長就任不到一星期，就有某講師被一個無理取鬧的該校外省籍學生患者打了一個耳光，事情鬧到要請莊校長親自調解。又學校解聘了十多位教授，其遣散費要醫院負擔，如此煩雜的事情不斷地發生。

三十八年一月傅斯年先生就任台大校長，傅校長特別關懷附屬醫院，費了許多心血和時間，極力想把醫院改進成爲東亞最好的教學醫院。那時大陸遷台的同胞日見增多，在那社會不安的環境下要改進台大醫院，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醫院內時常鬧事情，各報天天批評攻擊。例如：有些剛從大陸到台的病人，全家搬進病房當旅館住；隻身在台的肺癆病人一住兩三年，因無家可歸把醫院當做救濟院，一文不交拒不肯走；有一官員在醫院病故，其同事成群要打醫師，鬧得滿城風雨；病人與藥劑生打架，院長被法院傳訊；一軍人戀上女醫師被拒，在門診部當衆開槍自殺被救；一士兵擅自佔住醫院辦公樓一隅，不但不遷出且携槍示威，幸賴傅校長致某司令的一封信才得無事；保安機關突然派員到院，逮捕數名附匪醫師等等，眞是一波未平又一波。

三十九年省府撥巨款修復了被炸的樓房及全院的門窗玻璃，醫務之改進也漸有成就，如護理部之改善及附設高級護理職業學校之創辦，供應室及嬰兒室之設立，病人在院內自炊之禁止，住院醫師制度之樹立，三個內科和兩個外科之合併爲合一科，急診處及實驗診斷室之成立，放射線科之充實，及臨床病理和各種討論會之進行等等。